

如《山居》说：“对酒每怜沧海月，听潮时忆景阳钟。”古时景阳钟响，是早朝开始的标志。黄培饮酒听潮而忆早朝钟声，虽徜徉林泉，依旧不忘故国，怀明之心可谓深矣。而“每对古人翻往牒，泪痕湿处是长安”，对故国的一片痴心更是展露无遗。

黄培在诗中，还借具体意象来表达不屈气节。他说：“世争争葵藿，人谁念蕨薇。”黄培表明自己不会如葵藿（向日葵）那样逢迎新朝，而会效仿伯夷、叔齐宁愿采蕨薇，也义不食周粟，坚守民族气节。

这种对气节的坚持其实随处可见，“愿持此素志，仰以对三光”，“但期心似石，不畏鬓如霜”。

揽罪于己，开脱他人

审讯一开始，黄培就抱定了舍身取义的信念，对于官府审问，他或不作深辩，或揽于己身，尽量替他人开脱。

但在官府穷追猛打下，黄培诗案牵连之人越来越多。中途有人控告顾炎武曾请求黄培为他搜罗反清志士的事迹，以编纂反书《忠节录》。山东抚衙此时已经不再敢作耽搁，立刻行文到昆山提审顾炎武。

黄培知悉顾炎武受自己牵连后，一面托人致意顾炎武，要他不作承认和已相识；另一面囑咐族兄黄坦，要他审讯时坚称未曾与顾氏谋面。后来顾炎武接受审讯时，就说“贡生是江南人，因在山东作买卖，将本钱寄在章丘谢家，后来谢家把本钱亏损，给了生员一处庄田，贡生从来不认识姜家、黄家是谁。因去年五月间，与谢家在济兴讼，才认识姜元衡，他就牵带贡生。”黄坦接受审讯时，则声称“顾宁人（炎武）从未到过我家，亦不认得他为谁。”

与此同时，顾炎武的亲朋好友也在多方奔走，积极营救他。他的外甥大学士徐乾学，写信给山东布政使说：“母舅顾炎武，赋性怪僻，不合时宜……显属仇人诬陷所致。”顾炎武的朋友朱竹垞在刘芳闳幕下为官，也多番相助于他。

黄培诗案虽然开始声势浩大，但最后绝大多数都从轻发落，免于追究。山东巡抚根据前后审讯所得口供，拟就判决书，具奏清廷，请求裁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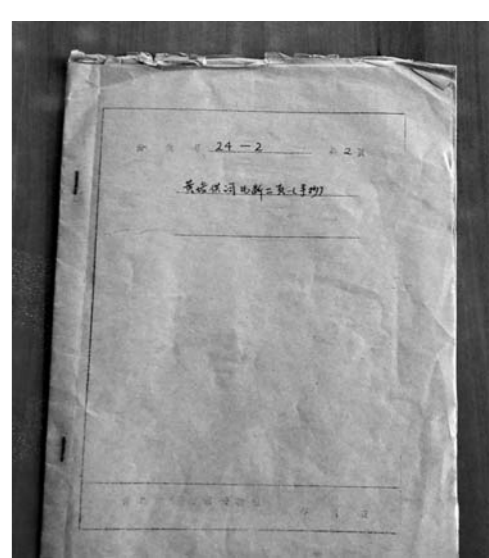
判决书上对于顾炎武的处理是：“据讯顾炎武坚称未曾到过即墨，更无有托黄培搜集事实作《忠节录》之事。黄坦亦声称与炎武不识，则顾炎武情属无罪，合行开释。”

对于首犯黄培，则“因系明朝朝臣，隐怀反抗本朝之心、刊刻逆书，已属不法。吟咏诗句尤见狂悖，且宽袍大袖，沿用前明服制，蓄发留须，故违圣朝法令，大逆不敬。应按以隐叛诽谤之罪。但律无正文，无从援引，谨按他律比附，定拟绞罪”。

山东巡抚的判决书连同奏章被送往清廷，康熙阅后认为较为公允，便同意执行。

黄培在狱中得知自己被判处绞刑，心情反而比原先更为平静。他饮食如常，谈笑自若。他对外甥宋琬说：“你应该知道我的为人。我当年因奉母灵柩归乡而未为先帝殉难。回来后虽一心想殉难，可惜没有合适机遇。如今这便是好时机。我不想上诉无罪，只希望能一死。最担心的便是最后没死，而使我有畏死的嫌疑。如果幸而能死，也不负平生。”行刑之日，谈笑自如，犹作诗以明志，从容就义。

黄培遇难后，其子黄贞明携妻子离开即墨城，搬迁到崂山脚下居住，极少与人交往。“其女年方及笄，矢志不嫁，奉父画像出家崂山潮海院为尼，法号‘喜岩’，后迁巨峰前白云庵，今庵前白檀花为其亲手所植。”黄事佺说。



青岛博物馆所藏《黄培供词手抄二页》（手抄）

唐”“匈奴”都是禁忌的禁词，所以《四库全书》馆臣将其改成“壮志饥餐飞鱼肉，笑谈欲洒盈盘血”。南宋爱国文人张孝祥的名作《六州歌头·长淮望断》，其中描写圣贤孔子的故乡被金人占领，以激发后人收复故土的热情，“洗泗上，弦歌地，亦殢腥”。不巧“膻腥”又犯了乾隆的忌讳，便改成“凋零”，其意虽通，但却失去了原先的韵味。

南宋爱国诗人陈亮的水调歌头·不见南师久》云：“尧之都，舜之壤，禹之封。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。”“耻臣戎”又犯忌，被改作“挽雕弓”。最为离谱的，是辛弃疾的《永遇乐·千古江山》，因为其中有“斜阳草树，寻常巷陌，人道寄奴曾住”，寄奴是南朝刘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，刘裕曾数次北伐中原少数民族政权，收复不少大好河山。在辛弃疾的眼中，刘裕是光复汉政权的伟大英雄，对他心生景仰。可到了异族入主的满清，刘裕成了反面人物，他的功绩也很少提及，而且他的小名也成了忌讳。所以馆臣们又用心良苦地将其改换成“人道宋主曾住”。

如今视为笑话的改易经典，曾经却是不可质疑的最高权威。

据史料记载，因查禁而被销毁的图书约为13600卷，刻版170余种8万余块。除了焚毁民间藏书外，清廷还对明代档案进行了系统销毁，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被全部销毁。因此《四库全书》完成后，也引发了诸多的批评。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便痛心地说：“清人纂修《四库全书》而古书亡矣！”

2017年5月17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傅欣迎

电话:(0531)85193021 Email:wsfxqlrw@163.com

■ 齐鲁名士

明亡后，他避居乡野，却时常幽愤神州陆沉。苦闷之际，诗文自娱，借物言志，抒发块垒。这些满怀故国之思的诗篇，被有心人深文周纳，加以利用，成为清初江北最大文字狱的导火索，而他也就义于济南。

黄培：心怀故国因诗罹难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
本报通讯员 万太飞 李崇虎

康熙七年（公元1668年）的农历二月中旬，京师郊外已是桃花嫣红，柳枝碧绿，洋溢着盎然的春意。可寓居慈仁寺的名士顾炎武，却始终满怀忧虑，提不起一丝赏景的兴趣。

昨日他忽闻信报，言山东抚衙行文到故乡昆山，要提他去济南受即墨黄培反诗案的审讯。

顾炎武和黄培均为明朝遗臣，彼此惺惺相惜。他曾数次游崂山，和黄培相谈甚欢，还为其族叔黄宗昌《崂山志》作过序。如今黄氏案发，他难以自安，遂赶赴济南自首。

顾炎武命运如何，狱中黄培的态度举足轻重。因黄培极力保全、他人积极营救，顾炎武入狱七月无罪开释。而揽罪于己的黄培，则被判处绞刑，就义于济南。

“如今即墨人谈及黄培诗案，依旧钦佩他不曾动摇的民族气节，感慨他矢志保全他人的无畏勇气。”《即墨县志》副主编孙鹏说。

“持见既定，虽千人不能移”

黄培出身于世受皇恩的明末宦官人家。在即墨老街，便有一块名为“四世一品”的牌坊。这是明朝皇帝为旌表黄氏家族的黄昭、黄正、黄作圣、黄嘉善四世皆官居一品的功绩而赏赐的。

黄嘉善成边多年，历任要职，功绩显赫。其有五子绕膝，但最钟爱的长子黄宗宪因病早亡，长孙黄培便承袭了父亲的锦衣卫金事一职。

年纪轻轻的黄培入仕锦衣卫，他人无比羡慕。可他并不甘沦为权力的鹰犬，时常以“清正”来自励。为官期间，他发言不苟，处事得体，赢得同僚交口赞誉。书画家董其昌还赠诗褒扬他：“时配黄金印，身藏白玉壶。请看麟阁昼，有此璧人无？”

因父早亡，黄培由母亲宋氏拉扯长大，母子间感情弥笃。宋氏喜佛好善，黄培便涉猎释家，以迎母情。母亲常对他讲述善恶因循的佛家道理，借此提醒黄培身居官位，要常周人之急，济人之困。宋氏的谆谆教诲，黄培铭刻在心，所以纵使身处浑浊之地，内中亦不染污泥。曾有同僚评价他：“刚正不阿，持见既定，虽千人不能移。近君子，远小人，厂卫人多重其风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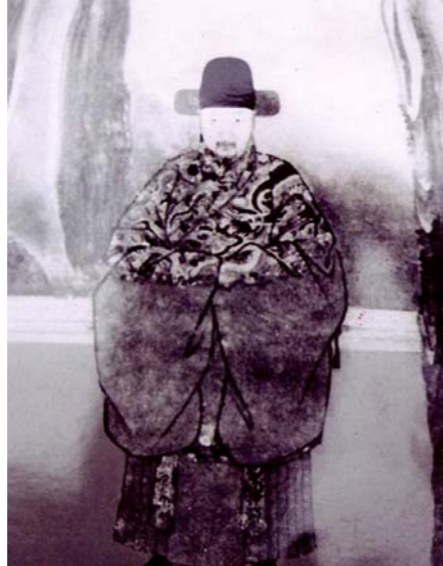
崇祯七年（公元1634年），直臣黄道周痛感国事日非，上疏指斥时弊积重，“土庶离心，寇攘四起，天下骚然，不复乐生”。他认为乱象根源，在上不在下，即君王察人不精，用人不明，以致“小人柄用，怀干命之心”。他在抨击帝王、首辅外，还举荐了一批清廉忠正臣子。奏疏上递后，崇祯颇为不悦，认为他含沙射影，非议朝廷重臣，且藐视吏部用人权威，“滥举逞臆”，有违臣理。皇帝给予黄道周廷杖八十的处分，交由锦衣卫执行。

明时廷杖严苛，常有谏臣殒命发生，是臣子的心头梦魇。廷杖操作性极强，它的有无，取决于帝王议断；但其具体效果，却依赖宦官好恶。如果宦官与受刑人关系良好，便会要求“着实打”，被打之人只伤及表皮，不危及性命。可若和宦官有隙，被关照“用心打”，则此人必无生还之理。

黄道周平素和宦官势同水火，此刻命悬一线。黄培多方疏通，代为周旋，他对抓捕的使者说：“道周君子，勿侵辱。其抗言于廷也，不屈而得杖。”又对廷杖卒吏说：“我希望汇报时，道周尚活。”

因此黄道周虽被杖责八十，却很快恢复如初。他生龙活虎，著书讲学，褒贬朝政。

后来刘宗周弹劾首辅周延儒误国，崇祯下旨切责宦官，说他们“比周结党，壅蔽耳目”，经常风闻上奏，查无实据，冤枉好人。旨下后，在言官中引发争议。吏科给事中熊开元、礼科给事中姜埙上疏为刘宗周抗辩。他们说：“陛下视言官重，责责之切……籍言官之口，人皆喑昧，谁与陛下言天下事者？”情绪颇为激切，触怒了崇祯。熊、姜二人被鞫送锦衣卫北镇抚司审讯严办。随后崇祯还不解气，



黄培画像



坐落于即墨古城内的“四世一品”牌坊

发了一道密旨到锦衣卫，要将两人秘密处死。当时都指挥使骆养性不能决断，就问黄培之意。黄培说：“以密旨杀人，非天子之法，请辞之。”骆养性和黄培随即向崇祯劝谏，也就没有杀熊、姜二人。

黄培虽尽己之力，周旋其间，解救群臣，但奈何国势日蹙，已是回天乏术。

“此贞此坚，期无负此石耳”

个人的际遇往往和时代脉搏紧密相连。当明朝日暮途穷时，黄家也进入多事之秋。

崇祯十六年，母亲宋氏患病，黄培心急如焚，他亲尝汤药，侍奉左右。不久母亲病卒，黄培痛彻肝肠，形容枯槁，以致难以视事。随后京师又爆发严重疫情，挚爱的小妻不幸染病身亡。接连的打击让黄培心灰意冷，就接连上疏请求奉母回乡安葬。

但此时明朝危如累卵，东北满清虎视眈眈，西北农民军攻城略地。纵使崇祯旰衣宵食，也难应付繁重公务，正需他人从旁分忧，自然不会放黄培归乡。黄培无奈，只能在京师设灵堂，每日恸哭母灵前，远寄哀思。

丧母之痛外，黄培还要承受国仇的到来。母亲病逝的第二年，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，崇祯帝自缢身亡。混乱之中，黄培矢志杀身殉主以报国恩。但因老母还未安葬，幼子也无人照料，他只得先投嵩峰寺落发为僧，等待时机回到故乡即墨再作计议。当年十月，他匆匆离开京城，扶棺抱子而归。

归乡之后，黄培忍着巨大伤痛先安葬母亲，再托付幼子。等忙完这些牵挂之事，他又想到了死。可族叔黄宗彦等人坚决反对，认为如今“天下扰攘，徒死何益，留此残躯，以图恢复”。

“以图恢复”，给黄培以微茫的希望。此后他虽避世故乡，苦闷度日，却和遗民志士积极往来，借机恢复故土。

在生活之中，一事一物往往都能牵起黄培的故国之思。可举目四望，江山依旧模样，时代面孔殊异，亡国之思，伤亲之痛，无一不萦绕心头，每每触动黄培内心感伤。

当年十二月，黄培到崂山之东，远眺海中八仙墩，思欲浮海遁世远去。

黄培忽见海边一块高丈余的墨黑巨石，虽经海水侵蚀，依旧光亮夺目，深感惊奇，便和同行之人合力将石竖起，见上之花纹有峰峦之像，更觉奇异。黄培感叹巨石和其心一样，就把它运回家中，立在书斋前。黄培特意把书斋名为“丈石”，每日和巨石对视，连门也很少出了。他时常感叹：“此坚此贞，期无负此石耳。”

斋中丈石，内含黄培之心，虽经世事消磨，却坚贞如初。

其间，顾炎武由济南数次到达崂山。他与黄培声气相通，共具反清意识。顾炎武为黄宗昌父子编纂的《崂山志》写序，其中有：“故御史黄君居此山之下，作《崂山志》。其长君御史（即黄宗昌之子黄坦）脩而成之，属余为序。黄君在先朝，抗疏言事，有古人节，概其

言盖非夸者，余独考崂山之故，而推其立名之旨，俾后之人有以鉴焉。”

有人说顾炎武流连崂山多时，并非仅为游山玩水，也不单是撰文写诗，而是秘密联络志士，意图复明。

其事有无已不可考。但在复明之事上，黄培一直是顾炎武的坚定支持者。据黄氏后人黄聿佺所作《黄培年谱》记载，顺治十八年（公元1661年），于七反清起义爆发，董樵和姐夫宋继澄来到即墨，与黄培密切接触。之后黄培通过董樵以物资接济过于七军。

在平时，黄培也不顾清廷的剃发易服命令，依旧蓄发留须，宽袍大袖，朝服朝靴，作汉人打扮。即使因此而遭牢狱之灾，也初心不改。

顺治四年（公元1647年），即墨知县周铨见黄培不肯剃发易服，就借机勒索他500两白银。黄培不肯就范，周铨便以违抗清廷服制为名将他逮捕，解送山东按察院。黄氏族人花费千两白银上下疏通，才将黄培救出。

突如其来半狱之灾，令黄培更加心灰意冷，更加愤懑。士不平则鸣，世道的变迁、个人的际遇，都为黄培抒发块垒提供了素材。所以虽然黄培起初不作诗，但“国家不幸诗家幸，赋到沧桑句便工”，他独坐书斋，将悲愤、困顿、郁结诉诸笔端，化成诗篇。

黄培起初作诗极为谨慎，对这些洋溢故国之思的诗篇，往往诗成则毁，绝不轻易示人。

但随着反清斗争的逐渐平息，苦闷中所作之诗数量猛增。有些寄托心意之作，黄培爱不释手，实在不舍付之一炬。

康熙元年（公元1662年），黄培将所作的266首诗歌，略加删改，集结成篇，命名为《含章馆诗集》。黄培族侄黄贞麟当时任凤阳府推官，便应叔叔的请求，从凤阳请了五名刻字工匠，为诗集制版印刷。

康熙二年，《含章馆诗集》刻印完毕。此外黄培还刻印了《金刚经》《好我十二君》《汾阳王传》等书。

黄母生前好佛，黄培深受熏陶，便刻《金刚经》以表思念。《好我十二君》，是宋继澄寓居即墨时，和他人的唱和之作。而《汾王传》则是中唐名将郭子仪的个人传记。

黄培刻印这两本书籍，也有寄托之意。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，抵抗外族入侵，是黄培心中的民族英雄。而《好我十二君》此前名为《好我十三君》，黄培将其中写给仕清姜元衡的诗歌剔除，以表志于明朝之心。姜元衡后获悉此事，极为恼怒，决意借《含章馆诗集》进行报复。

《含章馆诗集》装订成册后，黄培将它们分赠给至亲好友阅览。但这些诗文，却引爆了江北最大的文字狱，给他带来杀身之祸。

未料大祸起于萧墙

黄培始料未及的是，亲友之间的颜面之争，因为旁人的策划参与，竟演变成朝廷督办的重大案要。

康熙四年，黄培的儿子黄贞明与黄培前妻

调：“如有收藏明末国初悖谬之书，急宜及早交出。”

与征书相仿，查禁反书的诏书也没有引起地方官的注意。诏书下达三月之后，仅有以投机著称的两广总督李侍尧上奏说，查出雍正年间下令销毁的屈大均几种著作。而其他省份的督抚，均声称未见裨官野史之类的书籍。

乾隆对地方督抚的再度敷衍更加不满，他借着屈大均之事大做文章。他首先责备号为人文渊薮之地的江浙督抚办事不力，比不得李侍尧那般干练。此外，他再度申明只要及时交出禁书，概不追究罪责，而有禁书不献将严厉追责。

在诏书的作用下，征书行动慢慢让位于禁书。地方督抚为了迎合乾隆的喜恶，经常小题大做，随意扩大查缴禁书的范围。起初禁书多是明末清初的书籍，黄道周、张煌言、袁继咸、钱肃乐、顾炎武、黄宗羲、孙奇逢等人的

·相关阅读·

乾隆时期兴起以编纂四库全书而征书求书的热潮。但在炫耀文治、汇总文化的同时，乾隆也有一种难言之隐：他想借这次修书，“寓禁于征”，

将不利于统治的图书典籍悉数销毁改易。因而著名史学家吴晗说：“清人纂修《四库全书》而古书亡矣！”

寓禁于征：四库全书的难言之隐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

清朝由于康熙、雍正的励精图治，到乾隆时已臻于鼎盛。歌舞升平之际，乾隆在武功之外，更为留意文治建树。

乾隆三十七年（公元1772年），他连下数道诏书访求民间藏书，“余搜四库之书，非徒博古右文之名，盖如张子之所云：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胥于是乎！”

但皇帝的求书热情，并没有得到地方官的透彻领悟。他们自认为此事甚小，便敷衍拖沓，导致征书进展缓慢。乾隆见诏书数下，征书却迟迟无成效，难免怒火中烧，遂严令各地据实奏复，并追究征书不力的官员。不久安徽学政朱筠就搜访书籍提出几点意见，并建议朝廷开馆校天下群书。乾隆因此决定开设四库全书馆，编纂囊括一切学问的大型丛书。